

星期評論

高良佐編輯

第三十五期

劉英士主筆

我們崇拜那批絕食七十二小時的戰士

蘇聯官方已於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公報，承認基輔失守。自從六月二十二日拂曉開火以來，至此逾兩三月，希特勒總算佔領了一個他所預定的重要目標。基輔雖稱全蘇第三大城，且為東歐產糧區域烏克蘭之首府，無論就政治經濟或軍事上言，我們總不便於否認它的淪陷對於蘇聯是種無可補償的損失。然自德軍進佔蘇伯羅彼得羅夫斯克與德尼甫夫等城以來，基輔早已四面被圍，對於它的最後命運，誰也未嘗可稱樂觀的預測。現在聽到它的不幸消息，我們都感覺在心理上本是有着準備似的，希特勒並未過於神速上給予我以突然的閃擊。

基輔之失陷，情景甚為可歌可泣，在現代戰爭史上，似乎不易找得這般悲壯的先例。據德報二十二日路透電，「德軍於攻入基輔之前，曾先攻其四週之堡壘及埋雷電網區域，並與蘇軍發生肉搏戰，德軍前鋒隊中隊隊進入市中心區後復被擊退，經過三日夜之激戰後，始行攻佔該城。城內人民多身受創傷，且未進食達七十二小時之久」云云。在傳統思想未被推翻以前，駐守軍城都認守土有責，糧盡援絕而後與城俱亡如張巡這般果勇與史可法者，史家固都認為難得，何況絕望一切觀念早已徹底改變了後今日，軍人為了保存所謂作戰實力起見，已可公然宣言不必守守一城一地的得失？看了基輔軍民忍飢抗戰的榜樣，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現代所謂長期消耗戰中死守一城一地的價值問題？

就一方面看來，基輔軍民的死守孤城，早已超過了他們分所應盡的責任，因為大軍撤退時所遺的可食之糧，在七十二小時前已斷不剩一粒。不管其他命令如何，一個負責留守的現代軍官，到了糧盡援絕之日，為了人道起見，總可自認他和他的部下的任務為已完畢。如果他的長官希冀他能多守一日，便早應當多留一些糧食。至於此種觀點，我們不難要向基輔英雄遙致致敬，因為他們是於該掛白旗之後，還能各本天良，至少守了三天三夜的神聖天職。

在另一方面，我們發現，蘇聯的最高軍事當局似亦非不希望基輔之「放棄」尚能展緩數日，他們也許是在深悔當日沒有多為留守部隊留下糧食！要不然，關於基輔易轍的公報，莫斯科的不該過於柏林一日——這似未便委稱蘇方毫無沒有德方那樣簡捷。

總而言之，一城一地的得失，雖非在所必爭，然就事實上言，得必有勝於失，而且損失勝於早失。在最近三四年來，我們的「長征派」軍略論者，為了擴展他們企圖樹立「敵後民主政權」的雄圖起見，竭力鼓吹一種變相的「退却主義」，反對人家固守陣地。基輔那種史詩式的壯烈犧牲無疑地將予這種理論以有力的事實上之駁擊。在馬拉維西，前進的唯物論者似乎還很崇拜這般的英雄主義。你看他們的表现，多麼可歌可泣！

(英)

中國文化出版社

星期評論社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八日



美日決無妥協可能

關於中日談話，我們一向認爲並無妥協之可能。對此信念，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者似乎很願在事實上予以證明。

東京二十五日合衆電：海軍部發言人新聞稿稱，陸軍發言人馬淵大佐對該報記者談稱：「一部份日本人民提議與日關係時，認爲日本之外交政策將脫離三項公約之基礎，此種看法，殊屬錯誤。余以爲日本之意識與倫理，俱不許有此種行動發生。」

日本之希特勒——東方合衆報中有一則——於其報導提及合衆社記者之時，談話更爲激烈。據云：「荷非日本用兵，其目的必不與美或成立接洽辦法。荷非日本之美國，即等其毀滅，日本人自當不記容忍。美日走向對峙採取敵對行動之途，殆無可避免。現已進至冰點。英法兩國正與希特勒全力搏鬥，嗚呼！而日本及耶古爾德則強硬之態度，即欲將日本政府與日本之建立「滿洲國」及「華北」之權推過大，絕不退回。一九二一年九項公約下之狀態，有如神所要求者。因日本之侵略性將全付東流。」

我們認爲前引兩段談話，確實是很確實，可以代表日本一切極端主義者的意見。

近衛上丁一當

美方認爲試探性聲明對日談話，衆人皆人仰，也許竟死灰復燃的希望。這是一

度表面上的和平努力，當然可告無非於夢想和平的孤立派了。近衛如何？他更遭受了他同主人——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的輕視。中野正剛說：「近衛內閣缺乏勇氣，以羅斯福對吉爾之努力，對付近衛及退出，似屬純粹有餘。」云。

援助必須及時

合衆社九月二十三日倫敦電：海軍部次長便羅斯在英國商會中發表演說，大略謂：非軍事之戰時論者修談天氣驟寒及沼澤可有功於作戰。此種樂觀論調極屬危險，蓋現代戰爭技術已使此種因素之重要性大見減低，恐「敵多野軍」已降臨上校，而「沼澤將軍」則將降臨中校云。

英軍到了出動的時間

倫敦二十五日合衆電：橫濱方面消息，度英總司令魏爾將軍曾與英海軍部商談本國海軍行會商，現已竣事，飛返印度。魏氏曾與首相邱吉爾，內閣閣員數人，參謀總長坎貝爾及其他高級軍官舉行秘密會議多次。此舉正與德軍圍會高加索油田及保加利亞攻擊之危機相聯繫，殊堪重視云。

歡迎英美經濟代表

倫敦二十七日路透電：英格爾銀行董事倪米亞爵士與英政府之代表與中國政府之代表，特組織財以經濟界代表訪華團。倪氏此行，係與美方官商有所談商，美財次阿爾明將與倪氏聯袂赴華，編句以府之財政與倪氏。倪氏此行，並將爲其助手。倪氏此行，係因俄出於對方之建議，蓋不久以前中國政府曾表示派遣經濟代表團赴英，以爲援華方式之一。各方對於華方之建議，極爲重視，而英政府委任倪米亞爲代表，亦足表示政府如何重視其事。又倪氏與美財次阿爾明聯袂赴華一節，亦可說爲英美兩國對援華問題密切合作之另一例證。

現在德軍已越過伯河而東

羅斯多夫區域採取攻勢，烏克蘭爭權之戰可說已告完結，此後以侵略軍所應注意者是如何保守高加索一帶之油田。英帝國軍隊已補充休養了三個星期，如不能在西歐登陸，另闢一個新的戰場，以便希特勒軍背受敵，至少也得派兵數十萬人，趕到頓河流域去與紅軍比肩作戰，以免久被捷德兩軍所包圍之慮。我們希冀魏菲爾將軍一退防之後，不久便有軍事行動上的重要表露。

現在德軍已越過伯河而東，瀕向頓河口上的羅斯多夫區域採取攻勢，烏克蘭爭權之戰可說已告完結，此後以侵略軍所應注意者是如何保守高加索一帶之油田。英帝國軍隊已補充休養了三個星期，如不能在西歐登陸，另闢一個新的戰場，以便希特勒軍背受敵，至少也得派兵數十萬人，趕到頓河流域去與紅軍比肩作戰，以免久被捷德兩軍所包圍之慮。我們希冀魏菲爾將軍一退防之後，不久便有軍事行動上的重要表露。

喪亂時代的文學

戴鐸

我們現在所處自然是一個喪亂時代。對於這世界的人為大屠殺，便是這時代最具體的表現。給其以因，自不十分單調，例如宗教家所歸之於人類精神生活之破壞，經濟學者會推想到國與國間的富源乃至人類間之財產之缺乏與分配等。大抵站在某一立場，就有從那立場出發的理論。不過有一點是大家公認的——就是世界現形論之擴張。這在文學中表現得特別明顯。那些就其語言而言，則家與女人，本來具有天生的高貴感，通常人度不以爲意，外界則最小事而波動，能使他們言談必笑，涕淚已流，食不甘味，有力而無力。所以這時代的作品中，常談可以引出其原由，身處的喪亂時代而全無的某一部。雖然，自從有史以來，天運間已不知曾產生過幾多可讀的悲劇，則被這不幸之時代所襲擊，也可說自古已然。

第一，亂世中個人羣體生活，文士不在例外。衣食雖受打擊，精神亦受打擊，其寫作的情調，自也全變。如吳郡和年輩，四方無事，一門之內，自必少不得用幾能詩工文者以爲裝飾品；那些家國之高尚與詩公，同時對之禮敬有加，就是巨商大賈財富，也可資其分潤。這一切等是亂世以前的事。亂世中固也有些自傷於亂世之詩，但就一般而言，恰與亂世相反。亂世中也不宜作悲酸求乞之語。一遇亂世，他們却絕不願早放棄本來，或採拾子粟，爲賦以新詩之圖；或落荒江湖，送賄買什一之利。至於棄書去劍，投筆請纓之例，亦頗罕見。希臘作家司索福克及希臘多羅等，都曾經過軍役。英荷詩人荷甫，當愛德華三世王時，且因作戰受傷。寫作在這種情形下更成副業，而非安身立命之具。無怪荷甫僅當十七世紀英國內亂時代擔任詩人，停止寫作至二十五年之久。設在亂世大變之中，雖仍不克噴噴吟吟，視寫作如性命，則恐不備知詩者，就是一

身的福備亦復難圖。加以稚子流離，老妻孀，無限的可哀憫，過半因之而起。身安良之亂而杜少陵不是無爲什間在無衣無食而嗷嗷呼號嗎？

少陵而且如此，則更何況那幾胸襟大開的文人！他們大多數似其抱憾失望。但是我們對此，似也未可加以厚非。一個不固定的世界之動盪，就是這時代人的命運而不可不講，而兵戈戰地，實是這目。則悲感之事，獨斷獨情，究亦文士常態。翻開一部中國文學史看來，被這時代的三大動盪，就都具有悲感。荷甫的一部中國文學史，宋玉的《高唐賦》、屈原的《離騷》、後代讀者的同聲。而自漢末至唐初四百年間，天下大亂，生靈塗炭，故其間俊文人的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潘安仁，陶明遠，江文通及庾子山等各有悲感，淒涼蕭瑟之致。古人云，「亂世之徵，文章哀怨」。的確，這時代如火如荼的豪華熱烈作品，亦不多見。人心厭亂既久，遂以「悲無」爲逃避，於是反抗前代儒學神學的道家及神仙思想遂流行。同時，富貴河海，榮華難保；歲月不居，體貌易衰，也是不少作者所日夕引以爲憾的。再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最風靡歐戰文壇的是杜士安夫思基及潘祿士德等一派沈吟冷薄的作品，而懷疑與諷刺式的傳記也以新姿懸時而起，其所引現的影響，至深且巨。這最耐人尋味與回味的却是當時英法兩國的名叫「果家」或「生與死」的一書。著者爲一素具文名的物理學者洛洛。大戰的次年，他的兒子果家死於軍役。他既刊出這書，記載他的亡子的靈魂自從其間連與他的音訊。這種文字的真確性究到如何程度，那是心理學及靈魂學所研究的範圍以內事。不過其時該書之能引起讀者的絕大興味，足以證明他對於現世的苦悶失望，想從另一幽冥的世界中去求得些許安慰。「生與死」，這書名就很奇特。太平時代壽考的人較多，故人也就少注意到生死問題。

窮世人命微賤，死的威脅可怕，於是本問題乃有值得考慮的必要。一個莊生，也許會唱「生者死歸」的高調；一個陶潛，也許會自寫作「死亦何傷」；一個蒙且，也許會探探應該為死早作打算的哲人態度。可是好生惡死，人之恆情，而以文士為尤甚。約翰生博士和盧騷等不都是時以死為慮嗎？貴者或軍人，一則醉心於徵逐，一則寄其全部精力於事功及冒險，反能夠發生死於度外，此正所謂「舍夫殉財，烈士殉名」。倘有從事「坐業」的文士，對於人世運會好作沈思與默察的工夫，故雖幽居默處，處境安全之至，而側身天地，回首風塵，每一寫景狀時，憂國憂鄉，亦輒不免慷慨於死神之激。近代伯死最出名的，曾文正公要算其一。蓋曾公備極憂患，且有清敬王節的文人氣質，故雖以身許國，而仍時有戚戚之懷。但曾公是能體諒亂世文士的心境的。其做歐陽生文稱「與世變相因」，故「時有亂離之慨」；又嘗以為「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樂；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達樂之驕。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文士而尚感憂亂，且多感慨，正如物不得其平則鳴，不足為病。曾公這種態度，也是多數批評家的態度。可是世界雖然好像毫無辦法，文士的憂慮過度失望，而他們也有種種求治的心情，他們並不棄置一個光明的美滿的將來於其腦後。所以在擾攘的時代中，有所謂預言文學應運而生。假用葉葉茶生永遠過着安居樂業，快活無事的日子，他們就用不着預言，他們但為自己的幸運而感謝，願時時天，不與外求。一旦人事不上軌道，社會失去秩序，大家都渴望着一個理想的好世界，文人乃製造出許多這類的世界來了。什麼春秋公羊三世之義，什麼王者名世之說，都是為亂世人說法的。什麼華胥之國，什麼武林桃源，都是使人忘去現世困苦的烏托邦罷了。當希伯來人變遷國限於埃及之時，便有大哲人摩西著出，憑其慧眼，昭告他們將來復興之日；其後國運日衰，而預言家也就一批一批的降生。他們的預言，究竟是預言充實呢，或已多少現實化了呢，現在不用討論。要之，其所憑藉之確信而有徵的。墨夫魯斯過到水旱兵疫，曾乞靈於神背圖及燒餅歌之類，或求神問卜，或依那那般假託為神靈所憑附的巫者。但真正的預言家，並不如此玄妙。他們既學識深沈，又聰明

睿智，故能運用其直覺與才力，由過去看現在，由現在推將來，而百世損益，千歲日至，遂全在其洞照之中。湯姆遜云：「詩是一切知識的本與末——其不朽也與人之心靈同」。所以世上儘有宣傳社會主義的預言家，而我們也同時承認，從事文學創造者的預言，亦自有其真知灼見，並不全是空虛的。當代戰爭之極，文明之弊，遠過從前，真作預言的文人也特別多，英國的章爾斯也許是這方面大家所最熟悉的一個名字。我們感謝預言家，因為在痛苦中，他們給我們以希望，指明了我們的吉祥前途。

至於強鄰逼處，國家陷於危急存亡之秋，文人處此，誠不免呼號奮發，願為保衛民族的戰士，於是亂世時代中有抗戰文學之名。不能以此自勉的文人，可說全無心腸；但純粹借此做號召的，却未必偉大。文人的第一要素是有放大的眼界及想像力；有加強的悲喜哀樂之自覺意識。一九一八年戰死的英國詩人歐文，確是一位愛國志士，而其自序戰詩的序言云：

這冊子和詩無關。
它的題材是戰爭，以及戰爭的悲哀。

詩就寓於這個悲哀中。
這是何等通達人性的吐屬。上次歐戰的第一年，德國就有抗戰詩歌一百五十萬首。這數字真可驚人。可是作者既不全是大詩人，而且有的根本不懂得詩人。任何從編練回以及類於靈性的愛國狂出發的詩，皆將為「繆司之神」所鄙視。

最後，我們要知道，所謂亂世並不限於外界的擾攘，也可應用到人類的生活上。例如歐洲的第十七世紀也稱為不安定，半因其時中古的宗教統一蕩然無存，新起的科學漸趨着舊有的神學與迷信，人類的信仰在兩種勢力的摩擦下難於得到適當的調劑。文人既為一些萬古長存的宇宙及人生之謎所規畫，遂不得不採取流行的哲學家的答案，沈思默察於世界及生命的過去與未來。所謂「形而上學詩人」就是反應這時代環境而生的。「形而上學詩人」在近代又復活了，正因第十九世紀末葉和現世紀初葉，我們精神生活上起了相類的不安與衝突。

民族文學釋義

朱金聲

然則反映混亂的文學與通常文學有無不同？我們的答覆是「無」。在何反映混亂的文學，凡足以垂久遠的，必其作者通明人情物性。我們上面說到杜少陵爲無衣無食而呼號，但同時也有「廣廈萬間」之願，與「憂國望年登」之思，這便是他通明人情物性的開關襟抱。我們又說到抗戰文學；但真正爲抗戰而努力的作者，不但僅是愛國志士，而且

是具世界大同觀念的愛國志士；因爲仇復侵略的敵人，但也憐憫他們，並使然於敵我所同蒙受的劫運——這又是通明人情物性之例。其他種言也好，哲理詩也好，要能成爲文學，其條件則一。合乎這條條件的文學能美化我們的生存，減輕我們自從亂中所受的苦楚，也許還可增進人與人的了解和同情，防止一個世界末日的到臨。

最近關於民族文學的文章，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討論的方向，也由漸從形式轉到內容來了。這還僅是開端，隨着民族戰爭的擴大和持久，我們相信，將來是更更深入的討論的。

我也願意貢獻若干關於民族文學的意見。但在說明以前，我們對於民族文學的定義，總得先有一個清晰的觀念。有人說：「明日的文學將是民族文學」。又有人則竟將民族文學看做一種遺產，而斷斷於如何繼承的問題。依照前說，民族文學顯然尚未降生，而依後說，則至少在我們的祖父或父親時代，民族文學便已是種大可誇耀的遺產了。幾方的觀點，相距如此遙遠，可見得一種基本的「正名」工作，似乎還是必要的。

甚麼叫做民族文學呢？我們自己的經典上沒有這個名詞，大概還是歐洲的舶來品，即英文中所譯 National Literature 的譯名。我們如要透澈瞭解民族文學的意義，還得先從西方的歷史談起。

四百年前盛行西方的是拉丁文學，或稱之爲古典文學。當時所有的重要著作，無一不用拉丁文寫。無論僧侶也好，教師也好，或別種有學問的職業人士也好，都不識不懂拉丁文，都不能不寫拉丁文。至於士階，則是在農奴和手工藝人之間流行。當時的土語約有四系：在歐洲南部有拉丁系變語，北部有日耳曼系語，中東部有斯拉夫系語，西部有克爾特系語。爲示區別於帝國的拉丁文起見，我們可以統稱之爲民族語系。當時一切法律典章的記載，固都不用民族語言，即在

文學方面，除了不甚高尚的山歌和俗曲以外，也都是用拉丁文寫的。

這從形式一方面說，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古典文學的特徵是帝國的，不是民族的，因爲從這裏我們只見到帝國的統一和秩序，而不能見民族的個性和自由。

其次，當時一般作家的生活情形，亦是說明古典文學如何受制於另一勢力的統治。他們多數隱居在幽深的寺院中，終日祇在昏暗的燈燭裏冥思，默禱，煎熬，引起無窮的迷惑，無盡的接塵。他們的心常想飛揚高舉，却又說不出要高舉到什麼地方去。他們的靈魂常被一種神秘的苦痛和快樂，或被一種抑鬱，煩惱，枯淡而不可解釋的悲憤所迷亂着。他們終日關閉在自己的觀念所造成的牢不可破的監獄裏，一心祇盼望着那個渺茫的天國。他們看見人生的途途上滿佈着毀解的陷阱，犯罪的危險，墮落的機會，魔鬼的引誘——撒旦在等待着要毀滅他們。所以他們一味的熱心勸教。當時所謂開導靈魂的書籍，與爲日常生活當作指南的「金鑑」，幾乎是文學主要的範疇。大家都熱心於天上的報酬，而不暇管人間的享樂。自然界一切外顯的表現，都被他們當做宗教思想的題材。

這從內容一方面說，古典文學的特徵是在具有濃厚的宗教性和出世的人生意義，故與人類現實的生活，距離很遠，而不能有強烈的感召力。現在我們知道，中世紀有兩種維持統一的东西：一是拉丁文，二是基督教。兩者都在妨礙新興民族心靈的解放。民族文學的興起，就

是針對着這兩種束縛而發。首先打破了固有的形式，而以活潑生動的民族口語，代替昔日帝國的文字。我們看見那用意大利語寫成的不朽著作有但丁的「神曲」，馬基雅維里的「霸術」或「王道」，阿利渥斯妥的「奧爾多佛里奧索」；用英語寫成的有莎士比亞的戲劇，史本復的「仙后」和密爾頓的「聖皇的哀詩」；用西班牙語寫成的有辛萊爾的「道吉阿維先生」。至於法蘭西語的清新美麗，則在拉布勒所描寫的大胆的幻想故事之中也獲得了充分的證明。民族的個性，從帝國統一的形式中，漸漸解放出來了。

但是最重要的變化，是在那題材方面——從宗教的崇拜趨向人生的追求。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很可以說明這個變化的性質。那一天是一四八五年四月十八日，正是春光豔陽時節，有幾個倫巴工人正在羅馬的亞平公路，偶然發現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古墓。將棺揭開，他們就看見了裏面躺着一個面色如生的少女，雙頰如玫瑰，唇邊含着笑。這件可愛的異蹟，很是感觸人心。一時大眾崇拜，人人稱羨，將那處女葬在大理石上，恭恭敬敬地送入大廟，舉成聖像，凝視着那悲劇如他的美，目光久久不移，因此惹起了宗教方面的狂想。神父發覺這將真是一種邪惡的新崇拜，因命人在半夜裏將她偷走，私下掩埋。但她的遺體竟在墳墓裏，卻使她葬也是徒然。因為詩人曾說：「她含有古代的神，世世須見她一面，便又從新開花了」。自從這朝聖的聖人埋葬了，她清供的聖廟，世界上便又人人迷了。自此以後，這朝聖的主義和寺院，漸漸衰頹，已不復見於世。至此又從新解脫了束縛而出現。和他們同時出現的，第一件是愛好「發明」的地理，第二件是藝術和詩的熱心，因而使人對於「美」和「力」的崇拜，又是從新聯合起來。自然乃又成為藝術上理想正當的工具。

用「民族的語言」來寫「活的人生」，這就是民族文學得以發展的根本條件。最初這種新興的作風，起源於意大利，後來順次征服法國、英國以至德國，一路上隨地變化，以助適合諸民族不同的特徵。在英國，我們看見海峽和小說結了完美的姻緣；在法國，我們看見戲劇的

讀文和喜劇；在德國，我們也看見冷峻深刻的悲劇和詩歌。

因此，從歷史上看來，我們知道民族文學的發展，實在含有兩個次序：

一，為了解放被束縛的心靈，新興民族努力掙脫古典文學的枷鎖，在形式上，以民族的語言來代替帝國的拉丁文；在內容上，以狂熱的人生追求，美和力的崇拜來代替天國的幻想。這樣便奠定了民族文學的生命之基礎。

二，以後各民族因為秉賦不同，史地環境亦殊異，乃逐漸在文學上表現它們獨有的情懷；山川水色剪成了它們的衣冠，兒女英雄游泳了它們的熱感，因而可從不同的民族文學之中發現着不同的光彩。這樣裝演了民族文學的特色。

要求解放個性，然後發揮它們的個性，這就是西洋民族文學發展的基本趨勢。

由這點點以去檢討我們的文學，便可很快地發現今日中國的高潮，實和四百年前西歐諸國的情形很不相同。

我們之用自己的文字來寫自己的生活，即依最低限度的估計，也該已有兩千多年歷史了。無論詩經，是漢賦，是唐詩，是宋詞，是元曲，乃至明清的小說，在內容上和形式上都十足民族的，並沒有外族文字之混雜的，也沒有任何統一性的宗教，曾經決定我們文學的題材。因此，我們今日如其說要創立民族文學，便寧說要改造傳統文學——這似比較切合事實。

因為年月久了，我們的文字和口語漸漸離異，已經不能完滿地傳達我們的情感。澎湃澎湃的白話文學運動，已使我們向前邁進了一步。我們如何方能豐富我們的辭藻，使得文字和口語更加融成一片，自是今天應該注意的問題。但是最緊要的，我以為，還是我們民族文學的訓練。兩千多年以來，因為儒學守舊觀念的影響，我們的文學總是缺乏有力的美；又因為我們尚是一個大陸國家，沒有海的明媚和變幻，因此我們的文學中便缺少幻景，連帶缺少強烈的同情和憤恨，缺少悲劇感。

民國以前，文學不去說罷，即以五四以後的新文學而論，雖然在描寫的題材上，已經不啻擴充若干倍，但就氣質上看來，實在還是沒有什麼改變。我們看見了精緻的心理分析，也看見了委麗的諷刺，却看不見生命力的洋溢。近來大家越發發奮，竟只注意到那渺小的「暴露」

新詩與舊詩

余賢勳

本刊第三十一期載有魏歌川氏「談新詩」一文，閱後，我總覺得新詩似乎已經到了三種嘗試。第一種是將舊體文選篇編成詩詞的格式裏面，然後再加工些新式標點，分行排列。這一種試法者大半是舊體詩的讀者，他們不能認真寫詩，又以為新詩並不講究字句音韻，此一大方便，不可失，於是大小抄作，結果弄得新詩不啻舊詩的翻版了。第二種是採取舊詩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九言等形式的句法，其分行排列，有了標點，便自以為詩。不管句法能分不能分，不管分行排列與否，無異，不管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九言，總之，一切都不問，只要寫出印出，便算是詩。於是初創這新詩的人，新詩東傳，詩人特別多，中國似可稱為詩人之國。這一種大半便寫了一班年輕的小夥子，他們的口頭是多前作，少讀者。文字寫作技術尚不熟，詩的修養條件也不足，這一班作家在今日想到了以前的老蒼，恐怕也自有點汗顏吧。這一種嘗試的失敗，只要看那一時的詩人，那一時的詩來，現在如何，便可知道。第三種是整個將舊詩的方法搬過來，有一定字數的句法，有一定排列的韻脚，整齊劃一，毫不苟且。此不過是西洋做詩方法的一種，嘗試的結果，發現了這一種方法比填鴨還難，雖然打破了舊的桎梏，自己却反鎖進了新的圈套。這種嘗試不久也就烟銷雲散。因此，過往嘗試寫作新詩的人，多半將頭腦的另尋出路，或是還入復古，或是嘗試舊詩。此種失敗給予現在青年的影響，固不小。現在探討文藝的青年，徘徊於新

起來！我們如果要求民族復興，要生命力的持續和旺盛，便不能不要一種及具生命力的文學。西洋文學方在顯現它們的特色，我們却要大刀闊斧地破壞它們的精神。民族文學創作的根本問題，我忽沒有比這更覺重要的了。

舊之間的，其數不少。若專事於新詩的寫作，則遠於適在嘗試者之失敗，頗有茫茫前途，覺燈塔所射之燈，反則不知何處之有以法可辨。此中病根何在，似不值得費力探討。魏氏以為寫新詩的人缺乏想像力，他則沒有這種天才而能寫詩。詩固需要想像力，但這不是詩，多種元氣中之一種而已。我以為新詩的基礎，應即即於建立鞏固。詩終不能離開形式與音韻。即以形式而言，有了內容，沒有形式，如何表現了形式與內容二者不可分離。我們雖可以對任何決定的形式，卻不能不認形式為重要的。譬如以現在新詩的分行排列而論，這一種形式固是古決不可變，就值得考慮。舊詩詞與曲，並未分行排列，讀起來自然會與歌有別，而且詩是詩，詞是詞，曲是曲，界劃天然，不因排列形式而有改變。我們是否以這種形式為分行排列的便是詩，編了字句便是散文？我則是否以此種形式為代表中國的新時代？如我們青年輩心的請求，則在現今適用的分行排列法外，似也不妨再嘗試出一種更初的形式來。

其次便是音節問題。詩必須有音節，這在今日似乎無人再言之這條件。所謂韻，不過是使讀者口吻調利，當然不必定受韻書的拘束。但是新詩中的韻，究應放在句首，句中或句末？新詩的創作，固可以用任何協韻，可是句首句中的協韻法，在已往新詩壇上並未顯不成績。我以為協韻的方法，不僅是為協韻而已，還必須有音樂性方可——即所謂音節問題，除協韻外，還應注意到一句的詩讀來是否琅琅上口。今以舊詩為韻，同是屬於平聲的或仄聲的，中間便有高低隱晦之分。嘗

如「總是玉關情」，倘改「關」字爲「門」字，便不響了。「事奉木
下」，倘改「下」字爲「落」字，亦不響了。再如「八月湖水平，
湖風浪太清」，這兩句本是律詩的起頭，以律論，上句「水」字應爲平
聲，倘改「水」字爲「波」字，雖然合律，可是音調反而不響。再如
「萬葉多悲風」，五字皆是平聲，讀來卻何等響亮！由此看來，詩中
音節不在平仄的關係，也不如俗儒所說平仄排列的方法，而却是一種
自然音節的。新詩應否注意類此的音節問題呢，抑是僅求語韻即可？
一般主張新詩的人，說來說去，不外打破一切舊的拘束。此是消極的
破壞，即無積極的建設。中國新詩之不能發揚光大，原因正在此。
音節不是一件神祕的事，是可學而得的。我們雖不能效沈約說的
「自鐘均以來，此秘未睹」，却也不能說音節是一種天籟，各人有各人
的用法，不能代定。我所指出的音節並不是如舊詩中決定的平仄仄仄間
離，而乃是指出詩者應知一句之音節，須有高低抑揚之致。天籟固然
好，人工的音律却也不是不能尋求。唐人近體詩（如律絕體）字句整
齊，音調鏗鏘，正是在那齊整人工的音律以後。齊梁以前，因
弄沒有好詩，然而近體詩的音節，可以高唱入雲，却屢元分利用了人工
音律的原理。我們得不着天然的音節，即不能不注意到人工的音節，
這與音樂上的少數聲音能夠調出無數樂調，同一作用。

如何建立一種形式，如何建立一種人工的音節，這是新詩的先決條
件，也是提倡新詩者不容不認識的一點。這一條路若不闢開，新詩的
發展，畢竟甚難。新詩提倡者在此方面多研究，應作理論與試驗
同時並進的探求。可惜如今提倡與創作者太多，埋頭研究方法與理論

詩詞的境界

者太少。或有人說，偉大的詩人自己能夠創造，不必別人越俎代謀。
但我以為新詩如果必須分行排列，則在什麼界限上分行；如果句法可以
參差，那末韻應放在何處，類似的問題甚多，正待文學批評家指出一條
路來。

末了，我還要再說幾句話。文體的代辦本是自然的趨勢，不
必高喊打倒舊的，纔能建設新的。與其空喊打倒舊詩，不如埋頭創作
新詩。即使反對舊詩，却不能以忘了時代的罪名去責備舊詩。此可
以分兩方面來看。以學詩論，今人之學杜甫，是學他的文字技巧，不
是學他諷諫時事。所謂學某人者，只是在形式的技巧上，不是在內容
上。常人一見舊詩，即以爲古雅，即以爲古人化身，未免有點武斷。
其次，舊詩本嘗不能夠用新名詞與新事物，唐人即有先例。今人作舊
詩，亦往往用新名詞（如放原精舍詩即有是例）。我們決不能以詩的
體式對舊詩來判的好壞，而應當看詩的內容。舊詩自有舊詩的文字技
巧。何以古人能在那些束縛中作出好詩來？我們應該慚愧技巧不及
古人，而不能說時代不是古人的時代，以圖掩飾自己不及古人的弱點。
即以時代而言，魏晉有五古，唐人有五古，宋人亦有五古，可是內容則
各有其時代的事物來供描寫。常人所謂宋不如唐，唐又不如魏晉，亦
只是在文字技巧方面，並不是在內容方面。是見詩的新舊只在內容，
不在形式。於是我們便不能以形式去反對舊詩了。

提倡新詩似應該從新詩的技巧及方法上開闢一條路來；不是空喊打
倒舊詩，便能產生新詩。此種幼稚病，在中國今日，業已成了陳跡，
我們還是等待新詩的新理論吧。

任在田

王國維先生在他的名著「人間詞話」裏曾經談到「詞的境界」；他
說「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
所以獨絕者在此」。他對詞的境界，極端重視，所以批評詞的優劣大

率以是爲準。五年前談到這段文字時，我的心中就有一個感覺，以爲
王先生這個原則不適用於「詞」，也可適用於「詩」。前歲朱光潛
先生講學武大，特開「詩論」一科，恰巧討論到這問題，頗與我意，

兒孫多，多年積蓄，爲之一解。長夏多暇，爰本兩先生說，草成此文以獻正於博雅。

詞有境界，詩亦有境界。境界的含義究竟如何，似有加以解釋的必要。據「人間詞話」：「嚴滄浪詩話謂『感厲諸公唯在興感，羚羊獨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這話于先生自己說明可以應用「境界」二字的原委。至於「人間詞話」中對此二字更詳盡的解釋，我們也可列舉如下：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都於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古人寫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總之，我們就可進一步的談論境界。無論是詩的境界或詞的境界，一般的說，它總是一幅很美麗的畫境，或是一幕極生動的戲境。王氏所謂「景物」之境，我們可稱之爲「畫境」；所謂「喜怒哀樂」之境，我們可稱之爲「戲境」。他所謂「真景物」與「真感情」者，我們亦可稱之爲「真實的畫境」與「真實的戲境」。這樣解釋，初學的人看來，似乎更易懂了。

依照朱光潛先生在「詩論講稿」中的說法，每一首好詩都必自成一種境界。「無論是作者或讀者，在心領神會一首好詩時，都必有一幅

畫境或是一幕戲景，很新鮮生動地突現於眼前，使精神魂魄爲之鉤攝，若驚若喜，霎時間無暇旁顧，彷彿這小天地中有獨立自足之樂。此外儘大乾坤宇宙，以及個人生活中一切憎愛悲喜，都像在這霎時間煙消雲散了」。這樣看來，一首好詩必然有它獨立特出的境界，也就是說它是一幅完美的畫境，或是一幕生動的戲景。說到此處，我們不妨試舉幾首唐詩爲例：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當要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鷺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待婢賣珠圓，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杜甫佳人——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柳宗元漁翁——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賈島尋隱者不遇——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王維鹿柴——

綠得羅裙買，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李益江南曲——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借問，或恐是同鄉。

——崔頤長干行——

這幾首詩，有些是很真實的畫境，有些則是戲景。它們都是從那人生世相中攝取而來的一片段，一刹那，都各有種獨立特出的境界。第一

鬻於新世訓

馮友蘭

「新世訓」出版以後，承梁慶秋先生及似彭先生先後在本刊（第十一期）與「新經濟」（第五卷第三期）中介紹。我們二君對此書都極稱許，這是件件所關他道也。

似彭先生「新世訓」三點，其作商權。第一點，似彭先生說：「忠恕之道，在行處，在處地方，一定可行，但恐不其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可行。」「忠恕之道，便不是可以行忠恕之道的時候。如果在下棋的時候，也要實行忠恕之道，那便只有把我的車送給你的馬打，我的將軍送給你的馬吃」。似彭先生舉這個例的時候，大概忘記棋盤中間往往有八個大字：「黃河為界，兩河交兵」。下棋是一種遊戲戰爭。就其是遊戲說，對一個交戰團體那一個交戰團體當然用不着講忠恕之道。說忠恕之道，在任何地方都可行，此在任何地方，當然不包括戰時。但說下棋是遊戲說，則一方因怕對方生氣而不「過人大甚」，甚或作輸一兩盤，也是常有底事。

似彭先生又說：「下棋也許是小道。但在比較嚴肅底情況之下，我們的先賢還有「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等教訓。所謂「不讓」與「勇為」，與忠恕之道，是有衝突底。根據「己之所欲亦施於人」的原則，我們只有「當仁而讓」，才可滿足別人「當仁不讓」的欲望。但是「當仁而讓」決不能成爲行為的標準」。似彭先生似乎以爲，凡是行忠恕之道者，都要遇事退後，其實，行忠恕之道者，並不是如此。見義勇爲就是勇於行道德。勇於行道德，怎麼會與忠恕之道衝突呢？我有一種道德行為，並不妨礙別人也有同樣底道德行為。不但不妨礙而已，如別人亦有此種道德行為，他還與我志同道合，相得益彰。根據「己之所欲亦施於人」的原則，我勇於行道德，我亦希望別人勇於行道德。但行道德事，並不是如一碗菜，一塊肉，我先吃了，別人即不能吃。道德底事是大家都可以行，而且都應該行底。況且勇於行道德，亦包括勇於行忠恕之道。勇於行忠恕之道，決不會與忠恕之相衝突。「當仁不讓」是說：行道德的時候，人不可互相讓步。讓步，而只說不讓於師呢？因爲一個人的師是他的表率。人常有一種想法，以爲他的師不能作，他自己似乎亦可以不作。學校的學生，倘有甚麼不安底行爲，而受別人批評時，他們常說：教授們亦是如此。孔子說「當仁不讓於師」，即是說：即令你的教授作了些某種不道德底事，你還是不應作那種不道德底事。即令你的教授不作某種道德底事，你還應該作那種道德底事。原文之意如此。離開原文之意，專就「當仁不讓」四字說，行道德底事有甚麼可讓呢？「道德底事是大家都可以作而且都應該作底，並不是一個人作了，別人即不能作，何必要讓？」讓固然是有一種道德行為，如果大家不讓，即是爭着要讓。不爭亦是一種道德行為，如大家於不爭不讓，即是爭着爭着要讓就是讓。爭着不爭就是不爭。爭着行忠恕之道，就是行忠恕之道。

似彭先生又說：「最近美國報載馬丁飛機公司在三個月內賺了五百萬元，於是工人起來要求分紅。在這種情形之下，馬丁是應當行忠恕之道的。而要求分紅的工人，應當繼續地要求下去，大可不必犧牲自己，而爲別人的便利」。要求分紅的工人，應該繼續地要求下去，因爲工人不應該設想「假如我是資本家，我也要剝削別人」。因爲剝削別人，是不道德底事，工人不應該如此設想。類此底情形，「新世訓」（頁四九）中已有討論。

第三點，似彭先生說：「作者在爲無爲一篇裏，提倡一種無所爲而爲底態度。一個人作事，可以只問應該作不應該作。應該作即作，不應該作即不作，不必計較他自己是將因作此事或不作此事而得利或受

書報春秋

國防經濟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廿九年八月初版 實價二元四角

緒言

是以社會爲本位底社會，不是以家爲本位底社會。「新世訓」原書底習慣，應該稱爲「家訓」。我所以不稱之爲「家訓」而稱之爲「世訓」者，其理由即在於此。此點看了我的「新世論」中「說家國」及「原忠孝」二篇，即可明瞭。

實秋先生提出兩點。第一點，實秋先生說：「第五篇開導引的例子不甚妥當。因爲這極宜法，容易令人誤會，以爲關於一件事，中國人和美國人，有兩種生活方法」。此點甚是。有機會時，我甚願將第五篇開導加以修正。第二點，實秋先生說：「所謂『抗志希古』，以古人作品爲衡量，爲標準，則正像阿諾德所謂『試金石學說』，是早已爲人所詬病底一種方法」。我於「新世訓」提到「抗志希古」，意思只在說明「凡作事均須以較高底標準爲標準」，不可如有些人，只有一兩篇文章經人稱許，便自以爲滿足。若真講藝術，則我並不如此說。我於「新理學」論藝術章中說：「歷史中大詩人依照本體樣子（詩的體）作詩，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常人又依照大詩人之詩作詩，則只可算是『取法乎中，僅得其下』」。

界大戰經濟社會史，對於各國戰時經濟狀態以及各項緊急措施，加以詳盡確實的敘述，先後出版數十厚冊，業已成爲戰時經濟研究資料的寶庫。戰後與賠款問題，失業與經濟恐慌，在戰後十年之內接踵而起，吸引了一般大政治家和名流學者的注意，於是他們對於戰時經濟所發生的研究狂熱，逐漸冷淡下去。無論是在戰勝國或戰敗國，多數人在一九三三年前，只想克服戰時的經濟或財政困難，而以恢復繁榮或建設永久和平爲目的。大家厭惡戰爭，夢裏也想不到不久又要戰爭。但自希特勒當權以後，德政府抱定宗旨，欲以戰爭爲達復與目的之手段，有計劃的鼓勵備戰，於是著名的經濟雜誌，如「德意志國民經濟週刊」和其他日報副刊等，都特闢國防經濟

實，此即是無所爲而爲」。似彭先生亦贊同，人雖有此種態度，但更說：「一個人作事，不但要問某事應該作或不應該作，還應追問某事爲甚麼應該作，或不應該作。這一問就要問到某事作了之後，或不作之後，要發生甚麼結果。我們即不必計較自己因作此事或不作此事而得利或受害，却應計較作了此事或不作此事，對於社會底影響是好或足壞」。此說是不錯底。我於「新世訓」（頁七五——七六）中已說過。不過似彭先生心目中，還似以爲利與義是不相容底。其實所謂義的行爲，就是於社會有利底行爲。所謂不問利害者，只是不問對於行爲者自己底利害，不是不問其對於社會底利害。一般人對於此點，多不清楚，以爲儒學只講義，不講利，必亦不贊同爲社會與利，而要叫社會中底人都「以軍食，以飢飲，居陋巷」。這是完全錯誤底。此點我於「新世訓」（頁七七）中已有討論。於近作「新原人」（尚未發表）中，更有詳細討論。

第三點，似彭先生以爲「新世訓」對於齊家的道理講得不很充分。對於齊家的道理，「新世訓」中所講甚少。因爲我以爲現在底社會，國防經濟學是經濟學的國境中間新各國痛定思痛，乃對戰時經濟加以系統的研究，剛出來底花朵。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一般經濟學家似尚未曾用過國防經濟學或相類似的名稱。而這一類的著作，也就日漸加多。由於治學方法的的不同，英國方面的研究大都偏重理論，尤以皮古教授的「戰時經濟學」爲箇中翹楚；而在德國則一般學者多偏重於過去事實的檢討，期在經驗中獲得教訓。此外，美國的卡內基和平基金委員會又曾邀請各國專家與負責當局分別撰著世

專講，而著名大學的經濟學系，也多特設國防經濟學講座（例如柏林大學就聘請了一位海斯少校來主持這個講座），並且獎掖後進之士撰著有關國防經濟的博士論文。此外，有許多研究會，講演會和討論會之類，也都應運而生，共負同樣的使命。在另一方面，軍部內的特設機關，亦從事於國防經濟的研究與設計。在如此熱烈的推動之下，納粹式的國防經濟學的進步，當然是意料中之事。過去對此類研究，如前所說，都偏重於具體事實的描述和零星問題的探討，而今則就根據這些初步研究的所獲，以從事於普遍原理的闡釋。國防經濟學的名稱與內容，由是釐定，而這一門科學的基礎，也得正式樹立。

就名稱而言，大家覺得戰時經濟問題的適當解決，須於平時預有準備，猶如戰時所用的陸海空軍，應於平時預受訓練。戰時所發生的困難，大部分應當而且可以未雨綢繆。所以戰時經濟的研究，必將擴大範圍，把平時經濟也包括在內，而這一門科學的名稱，應該叫做「國防經濟」。在內容方面，起先的研究是僅按照因子的分類，如分戰時金融，戰時財政，戰時農業與戰時食糧等；現在則隨研究範圍的擴大和確定，改用四分法了，即按國防經濟的四種形態，分別研究。此四種為國防經濟（平時經濟），動員經濟，戰爭經濟和復員經濟。在每一種內，可再按照人工，土地，產業及工業等因子來細分。

國內出版界在抗戰開始以前，即已供給了這部有關國防經濟的書籍，其中較著者如徐宗士的「度古：戰時經濟學」，陳毅撰「森武夫：戰時經濟學」，並且獎掖後進之士撰著有關國防經濟的博士論文。此外，有許多研究會，講演會和討論會之類，也都應運而生，共負同樣的使命。在另一方面，軍部內的特設機關，亦從事於國防經濟的研究與設計。在如此熱烈的推動之下，納粹式的國防經濟學的進步，當然是意料中之事。過去對此類研究，如前所說，都偏重於具體事實的描述和零星問題的探討，而今則就根據這些初步研究的所獲，以從事於普遍原理的闡釋。國防經濟學的名稱與內容，由是釐定，而這一門科學的基礎，也得正式樹立。

這些都不過是開路先鋒的初期作品，所以它們的內容，遠趕不上今日國防經濟學發展的水平。

這兒所提請注意的蓋問題者國防經濟論，據筆者所知，恐怕是把德國近年來在這方面研究的成果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本書。全書正文共三百二十四頁，幾乎全是根據德國材料寫成的。從其所列「參攷文獻」看來，凡是一九三七前德國所出版的重要國防經濟著作，著者差不多已完全搜羅到了，實堪稱所著的國防經濟與海斯少校所寫的幾本小冊子，尤其是他常用的材料。

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稱為國防經濟學；下編則稱國防經濟動員。上編所佔篇幅，雖有百頁之多，而只是在反覆說明國防經濟學的重要，依著著作通例，似乎應稱導論，而著者則以靜態名之，不知何所取義。下編分為四章：一日國防經濟的現狀判斷；二曰經濟動員；三曰戰時經濟；四曰經濟復原。就大體上說，這樣的分章辦法，是和舊書相同的，不過「復原」二字，似應改為「復員」，方與費氏所用原名相合。

在「國防經濟的現狀判斷」這一章裏，著者介紹一種觀察的方法，認為構成國防經濟力的因素有「自然的」和「社會的」兩類。自然因素包括土地與人口兩項，社會因素則含有輸送，原料，工業生產力，國際經濟關係，交通，殖民，貨幣，信用，資本與經濟之防護組織等八項。在「經濟動員」一章裏，著者說：「所謂經濟動員，就是把一個民族或國家所有的經濟力量，當軍事或經濟的戰爭危機之際，適應國防的需

求，組織而活用之」。可是他的討論，往往越出了這個定義的範圍。如在討論農業動員的時候（頁一六六），他談農業動員的三種任務為：

- 1 民族全體之供給（軍隊與人民）；
- 2 增加糧食與本國之生產；
- 3 統制和分配農業經濟之儲蓄。

按寫成第一種任務起見，即應採取相應的實易政策與土地政策：一方面與有關國家早在平時發生友誼關係，以便戰時獲得外國輸入，作為補助；另一方面要按國情，實行適當之土地分配，以增土地生產力量。很明顯地，這些都是平時的建設工作，而決不是戰機應急時的動員工作。著者以為此種工作的討論，應在國防經濟學中佔一重要地位，而不應在經濟動員章中補講。如果另立專章，亦無不可。

關於戰時經濟，著者認為對敵應從事於經濟作戰，對內則應實行經濟統制。書中對此兩點的討論，均甚扼要。此外，他還講到戰時經濟的難利推動，頗有裨於健全標準的工作。所謂準備工作，當然是指管理或統制機構的設立以及國防或經濟法規的制定之類。其實，這種工作的討論，也應併入國防經濟的章節之內。

最後一章討論經濟復原（應作復員）。著者把這分為兩個部份：善後和經濟復興。書中對於經濟復興，說得極其詳盡，凡英美德法意蘇等國為了應付全世界經濟恐慌而曾採取的措施，莫不引來作證。其實，這中間有一很大的部份是和國防經濟無關的，尤其不是屬於經濟復員的領域。

因為書中材料，大部份是從英文譯出，所以有些句法過於原文，難免犯着仿用磨牙之病，再

臨時似應注意修改，方能達到既簡且達的目的。儘管它有不少缺點，然在西醫難得之今日，

這書對於一般讀者，似乎還有它的貢獻。

拋錨之後

老向

民國三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暑氣解除之後，我乘公路汽車由青木關回北碚。一到鳳凰場，汽車拋了錨，時間恰當是太陽欲落。

車子能容多少人，我不知道，這一次男女乘客共有三十九名口，還不能說是萬分擁擠。車

由青木關開出的時候，就由站上的員工和扛行李的孩子們先推前後動，這是常事，誰也沒感到稀奇。可是停在鳳凰場車站之後，站上的員工們

推一陣，車子便走一段，不推便不動，這是說的下坡路；及至到了上坡路，推，它也不動了。

「嘿！要拋錨了！」一位白髮老者首先嘆了一口氣。這老者旁邊坐着一位背頭和尚，原來閉着眼睛，這時倏然睜開了。另有一位黃臉婦人發出一陣緊急的咳嗽。一位體態上裹着口紅的西裝的中國女士，一連氣兒說了三個「糟糕」。其餘的大多數客人都很安靜。

司機，最初似乎想把車子醫治的活動了。他揀一揀電機，看一看油缸，東觸一下，西撞一下，然後他去搬動車上的機關，那車子還照樣兒沒有反應。他笑嘻嘻的站成這線：「他在那裏打盹，要我替他開一開。他這兒子把修理的傢伙一件都不放在車上，教我有何辦法？」真

站長說：「請諸位乘客下來搬位，幫着推一下，推過這高崗去也許就行了」。這個提議一位青年首先接受了，緊接着兩個軍人也跳下車，我是第四個附議者，一共下來了七位，都是車上的立客。

「來，推，推向北碚去！」我們用力推，推，推。十來個大人的胳膊都推酸了，車子還是一絲不動。

「車上的人還是太多，請再下來搬位，好不好？」站長二次向車上呼籲了。這之又過，那位老者與和尚下來了，其餘大概有在車子上過夜的決心，推也不見得動了。

「來！我們再推！」車下的人們吶喊一聲，一齊努力。這一次，車子居然動了，居然走上高崗。一到下坡路，推的人們更興奮了，一直隨着車子跑了有五十米。不過車子始終沒有自動的消息，前面又來了一道高崗。

「我早知道這推也是白費力氣，這樣收車我走過世界也沒有見過」，那位紅唇女士這說。她吸燃一枝紙煙之後，把火柴的餘燼，很準確的投在車下那位和尚的袈裟上。

「站長，天已黑了，你得趕快想辦法呀！」那位黃臉婦人咳嗽着懇求。

「當然！」站長說。「你們等人急，我們也一樣急。回頭有車子過，看它可帶着傢伙，借來修理一下。再不然，我派人到青木關去喊救濟車」。

「站長，你前公事房裏可有電話，我要給北碚先打一個電話。他們一大幫人都等我吃晚飯呢，不通知人家一會兒不很對」。這是那位紅唇女士說的，她竟自己也從車上下來了。

「對不起，站上沒有電話」。站長說完，去了。

司機不見了。乘客們不待請求，便都下了車。那位白髮老者和背頭和尚，分坐在橋梁兩邊的石欄上，一個在捋鬚鬚，一個在凝望天空。其餘的人們都圍着那輛破車打轉，似乎惟恐它忽然自己跑了。

「有車子到了」。這呼聲還沒有落下去，一輛私人汽車已經驕傲的飛也似地過去了，丟給大家的是陣撲面的灰塵。然而那位紅唇女士硬說那小汽車中有位太太向媽招手來，可惜並沒有人替她證實。

天上的星光越來越密，大家都感到涼意。這道，隱隱的聽到路旁那家小茶館裏去。茶館裏存着的一些茶花籽，冰屑層層乾花，一剎時都變得精光。

茶館裏點着三盞菜油燈，一個木炭灶，倒也煙火十足，只是一樣吃食也做不出來。那位司機突然出現了，向茶館老闆地鋪備下一些湯麵

和掛鐘，老闆說：「你担保每天在此地掛鐘，我就去準備。」

站員們都躲到屋子裏去了，乘客們少數的遊走着，多數都坐下來吃茶，談天。只有那位和尚還獨自坐在欄杆上，是否在想，那就不不得而知了。我和那白髮老翁坐在路旁一段大木頭上休息，但是沒有說話。

我們在歌樂山多好玩，這會兒吃過晚飯，八個鐘頭拍完了，我們一定遊到北碚，說是有從香港帶來魚和酒！」那位紅唇女士在我們對面一條長凳上發牢騷。

「媽呀，媽呀，媽呀！」那位黃臉婦人捂着肚子，疼得在地上滾。

「這位婦人發痧了呢？誰帶着藥沒有？」那位老翁立起來，叫着去招呼。

「誰有救急的藥？」我隨着也叫了一聲。「我說這輩子東西不能不吃，你看吃下去的結果！」紅唇女士指着那位病者這樣譴責。

「車站上不知可有藥品？」那老翁彷彿是聽着我詢問。

「我去看！」

等我到了車站，正碰一位青年乘客和一位站員門口，他們都過來爭着向我申訴。青年乘客站上不願乘客，不盡責任；站員請求救的人早已派走，這會兒怕已到了青木關，站上的責任早已盡了。我說：「對不起，那邊一位婦人得了暴病，你們誰有藥品，快拿來！」

「只有一盒萬金油可用！」那位站員似乎知道救人先於門口，說完，立刻到房內取出一

個小盒來交給我。我急忙跑回病人那兒，叫着「這兒有藥！」那位老翁便對病婦說：「快抱一塊在肚臍上用力搓！」

「這管什麼用啊？」那位紅唇女士這樣批評着，緊接着又吼了一句：「車子來了」。她飛跑着迎上去。許多乘客聽了這句有力的號召，也都動起來。可是，一眨眼工夫，大家希望便成了泡影，又是一輛私人汽車轉過去。這一回，那輛車中的乘客，似乎連那位紅唇女士也都沒有招呼。

出乎那位女士的意料，萬金油居然奏效，病婦肚子疼得大約已經減輕百分之九十五，她可以坐起來了，也不再喊媽。

「我親眼看見她在青木關報警的時候喝豆漿，你無那是多『體』！」這還是那位紅唇女士說的。

「請你把萬金油還給人家去吧！」那位老翁慈祥的笑着對我這樣吩咐。

我又走到車站，那位站員和青年乘客的辯論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更加激烈了。雙方都在擺

着拳，眼中噴射着怒火，每一句中都夾雜着「老子」一類詞彙性字樣。乘客們都被這少團吸引丁來，圍成一個圓圈兒。然而並沒有容他們開博，真的救濟車到了。站長說：「看，我們可沒有說謊！」

大家不顧一切，拚命的上車，那位病婦和老者自然非最後不可。可是那門嘴的雙方，都還沒有罷戰，而且都開折話，牽制到對方的臉頰上去了。看情形，要不是車下的不肯上去，車上的也不肯下來，怕不打破頭破血出！車子已經開動了，兩人的罵聲還遙遙相應。

這輛救濟車上沒有燈光設備，只憑一隻手電筒照路，所以速度比半車快不了許多。我立在車後一個角落裏，左看看右看，並沒有發見那位病翁。心思：他下是逃走了沒有上來吧。

到了天生橋站，那位病婦下了車，向着車上說了「謝謝你們救我！」

第二天早晨再點鐘，車子居然擱上了北碚。一撥算一撥，兩個燈籠，把那位紅唇女士接走了。我一下車，只見那位和翁也跳下來。

通訊

疏散與生育

讀者：縱使政府當局並不「獎勵生育」，我也未嘗不想試試那做「爸爸」味道。人生有如走馬看花，世間種種，管它甜酸苦辣，總得嘗嘗一下，纔不枉此一遭。這是去年夏天的事，孩子雖說是有丁，方慶此願可償。不料敵國的空軍却找到了昆明是個最好的演習場所，於是不三不四的飛機便來滿天飛了。昆明的警報是要「逃」的，一逃就得走五六里，雖則不必定要翻山越嶺，可是郊外野阡陌也不怎樣平坦。我一面擔心着尚未出世的孩子，一面要共時常嘔吐的太大，一腳高一腳低地在那墳山裏亂爬。這時的情景也許可說狼狽

的復，然而每一念及自己快做爸爸，也就可以咬緊牙關，鼓起勇氣來了。十月十三日，這是回來，發現我的小小的院子變成一座荒廢了千餘年的古墳。屋頂塌了一個天窗，滿院子飛來了一堆破絮，還有一本舊書店裏發覺的無名氏手冊。這是炸彈再重五十磅的話，隔壁的七位無名英雄，也會飛臨這個道場！

昆明是住不成了。留了炸彈的危險，機過飛機，把家「預放」到鄉下。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在鄉下住了不久，太太的肚子更加大了，有一天房東突然給我一個意想不到的警告。他說我的孩子決不能在他的家裏出世。他接着雙腳：這並不是有意爲難，而僅僅爲了遵照本地的風俗。據說一家人家的住宅，若被別人家的孩子血光一沖，則這人家的子孫孫，也就完了。房東自己已有年紀，並不十分怕這道鬼氣，可是他不能不稍爲子孫打算，所以希望我能原諒他的苦衷。當然，我是一個將做爸爸的人，自己也很想做一個負責的「光前裕後」之人，怎麼能受他的事實教訓？

我們本已請安了一位粗熟的助產士來鄉下接生。這一警告便把預定計劃全盤打破了。省城是去不得的。要不然，當初何須疏款？郊外醫院緊湊過站，窮產婦祇好望門興嘆。交通不便，路又難走，倘若孩子等不及，要在半路上溜出來欣賞陽光，怎麼應付？這決不是把人發哭，我有一個媳婦，半夜裏就在城門口那個！或者你問我，「入國問禁」，古有明訓，爲什麼不先打聽打聽？我的答覆是：你得原諒

我是一個「名教」中人！在此以前，政府早已下令，不准郊外房東刁難疏散居民，尤其應該保護孕婦。我想我已有了保障，毋庸提心吊膽。問話略過，言歸正傳：當我接到了房東的警告以後，就去找一相熟的局長，實以春秋大義，請他執行政府法令，破除本地陋俗。他唯唯稱是，答允派員去和房東交涉。可是一隔三天，音訊杳然！朋友們勸我另謀出路，於是轉向衛生院去接洽。但是衛生院院在文廟裏，那是一縣的聖地，當其成立之初，就已接受了人民的要

求，絕不容許產婦！行政法令既不發生實效，衛生機關又怕聖地被污，我急得團團轉了，想託一個本省的同事去和房東商量，「掛掛紅」就算了事。誰知他說「這道要房東對這風俗究竟認到什麼程度！」他自己的太太也曾經在鄉下生產，也是弄得沒有辦法，結果把房子買了下來，纔算解決。又說他有一個親戚，生產得太急，來不及出門，引起糾紛，終以改選大門爲條件，費了很長的錢，尙未能使房東的心事完全了結。聽了他這許多報告，我當然不必再請他去做那勞而無功的疏通工作。幸虧天無絕人之路，最後終於找到了縣城裏的一個廣東太太，肯以五元一天的代價，租了一間白天熱得看不清楚鈔票數字的房間給我，孩子總算可在屋內出世了。

滿月回家，房東送了一份禮來。他的確和我很講交情，至今還沒有增加租的事。他是一個可敬的老人，對於世事看得非常清楚。他對子孫負責——爲了他們的利益，半點不肯讓步。

即使他不送禮，我也沒有理由怨他。我想誰？怨自己罷，像我那樣年紀已過三十，而又娶得「優秀婦女」的人，即辭揚光且生來檢定，似乎也夠爲父資格，至少我的太太是夠爲母資格。

怨風俗醜，也不成。因爲我是讀過文化人類學的，而且還有一個老師是屬於「功能派」，對於任何風俗，都能尋出它的道理來的。生孩子決不是件苟且隨便的事。爲了這，人們總把婚約看得異常隆重。在任何民族裏，每當文化鼎盛之時，添丁總是一家之慶，它總帶着家運亨通，保證着香火綿延。凡爲家主的人，自應在他治下，留出一個地位來給新生的享樂兒。而且親族制度最重血統，最忌「雜種」，所以孕婦應在家族的監視之下，明白「交貨」，不許偷偷摸摸的產在別處，致生以女爲男或偽裝壯一類弊端。對於這種杜絕流弊的風俗，如果明白了它的作用，當然也不應該抱怨。

時代是已變了。如今是在「發揚民族，以圖國本」的大前提下一提倡優生，獎勵生育。法律既承認了「非婚生子女」的利益，則對所謂「雜種」的觀念，亦必隨之改變。安得廣置千萬間，庇護後方產婦無數！小惡之父。

實行情
從下期出版日起，本刊要開始漲價了。附後士報紙本零售每冊二角，預定三月兩元，半年四元，全年八元；白報紙加倍。做修訂價格，預定全年者比較零售可省一元六角。我們希望愛讀本刊的人一律踴躍直接定購。